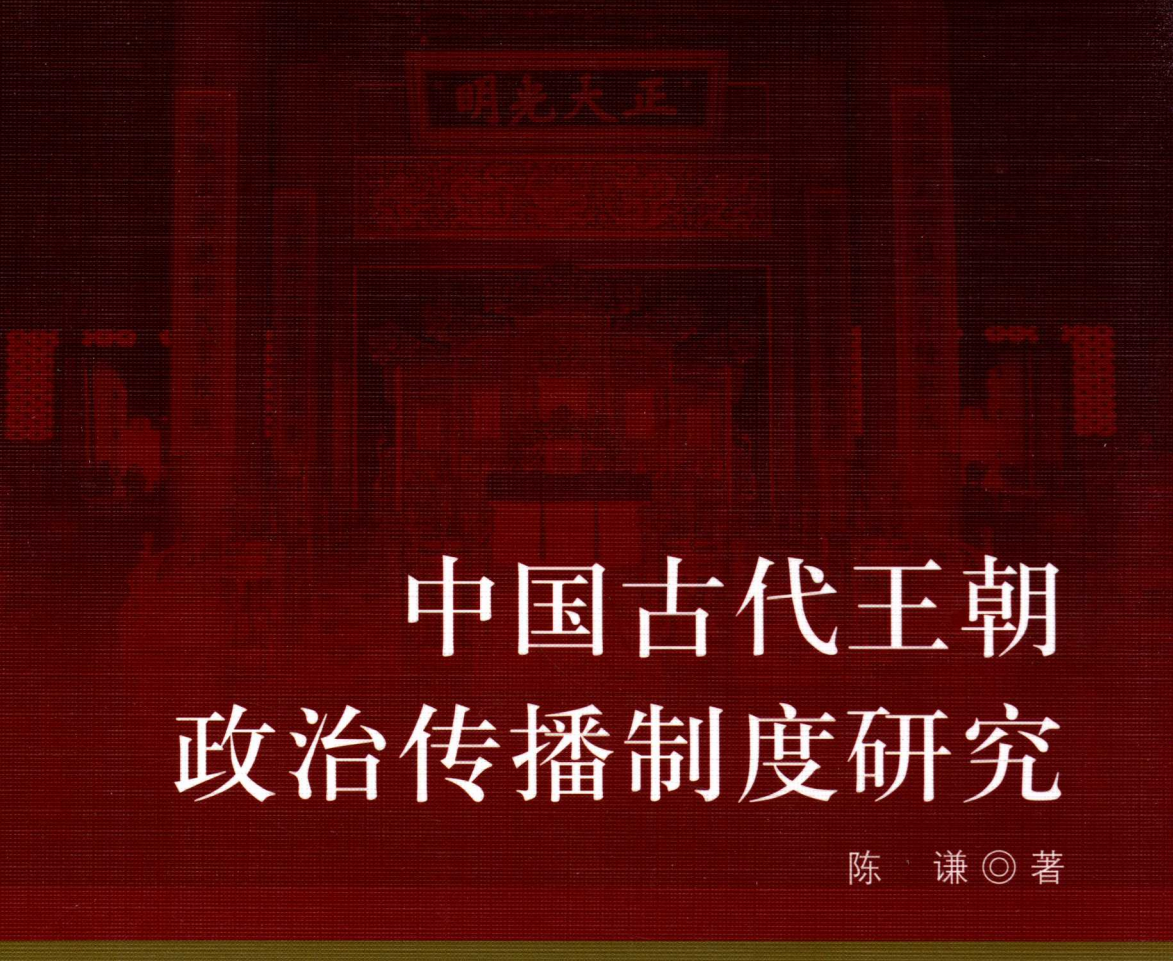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王朝 政治传播制度研究

陈 谦 ◎ 著

Study o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860002）

中国古代王朝 政治传播制度研究

陈 谦 © 著

Study o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制度研究 / 陈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7937 - 6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政治传播学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6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一 课题的由来	(1)
二 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3)
三 本课题所使用概念的界定与澄清	(10)
四 本课题的主要思路	(19)

上编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 思想及制度概说

第一章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思想及制度概说	(25)
第一节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思想的研究总结	(26)
一 中国的传播思想源远流长,属于政治传播及信息控制 范畴的观念、主张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26)
二 从传播学角度看,古人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控制思想、 主张较之现代传播学也毫不逊色	(29)
第二节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思想的基本特征——“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32)
一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政治倾向	(33)
二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学意义	(37)
三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与君主专制的政治思维	(38)
四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纲纽	(42)

中编 中国古代王朝信息传播相关 制度的历史演进

第二章 政治传播制度的萌芽时期——夏、商	(48)
第一节 夏朝的政治传播制度	(48)
一 原始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简述	(48)
二 夏王朝政治传播制度的初现	(51)
第二节 商朝的政治传播制度	(57)
一 商朝的政治决策方式	(58)
二 谏议活动与制度	(59)
三 商朝承担传播职能的官属	(60)
四 商代刑律中与信息传播有关的罪名	(61)
第三章 政治传播制度的草创时期——西周、春秋、战国	(63)
第一节 西周的政治传播制度	(63)
一 西周政治制度概述	(63)
二 西周的政治决策和信息反馈方式	(66)
三 与政治信息沟通、传递相关的职官	(68)
四 西周王朝的教育制度	(70)
五 西周政治传播职能的行使与制度创立	(71)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政治传播制度	(72)
一 春秋时期政治概况	(72)
二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朝议制度与决策方式	(73)
三 春秋时期诸侯国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官职	(75)
四 春秋时期的教育制度	(76)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政治传播制度	(77)
一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	(77)
二 战国时期的王权与决策形式	(78)
三 战国时期监察制度初步建立	(80)

第四章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的初步成型时期——秦、汉	(82)
第一节 秦汉时期政治决策的中枢——皇帝制度	(82)
一 皇帝的名号及权力	(82)
二 外戚与宦官对决策权力的攫取与把持	(83)
第二节 秦汉中央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85)
一 三公与丞相制度	(85)
二 西汉中期以后行政体制的变化及其职能转换	(87)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中央决策系统	(89)
一 朝议制度	(89)
二 决策的信息来源	(90)
三 决策的程序	(91)
第四节 秦汉的公文传递制度	(92)
一 公文的起源与作用	(93)
二 公文种类与传递制度	(94)
三 公文传递的一般规则	(95)
四 公文运转与权力行使	(96)
第五节 秦汉的监察制度	(97)
一 御史府监察系统	(98)
二 丞相府监察系统——丞相府司直	(100)
三 司隶校尉	(100)
第六节 秦汉的教育制度	(101)
一 太学的建立	(102)
二 教育内容、方式及考核	(103)
三 地方官学	(104)
第五章 政治传播制度的变乱与重组时期——魏、晋、南北朝	(105)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中央决策机构及其运行机制	(106)
一 丞相、相国及三公、八公	(106)
二 中书省的设置与职权	(107)
三 门下省的设置与职权	(109)

四 决策形式的演变与特点	(10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	(110)
一 皇帝与监察制度的关系	(111)
二 其他监察官职与机构	(111)
第三节 秘书省及图书制度	(112)
一 秘书省	(112)
二 图书活动与制度	(113)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	(115)
第六章 政治传播制度重整时期——隋、唐	(117)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中央政治体制	(117)
第二节 隋唐五代中央决策机构及其运行机制	(119)
一 中央决策系统的结构与机制	(119)
二 中书、门下两省的决策机制	(120)
三 宰相会议的决策机制	(121)
四 扩大的百官会议	(123)
五 决策机构逐步多元化	(123)
六 决策执行的程序与方式	(125)
七 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	(126)
第三节 隋唐五代的监察制度	(128)
一 中央的监察机构与官员	(129)
二 地方监察制度	(130)
第四节 隋唐五代的谏议制度	(131)
第五节 隋唐五代的教育制度	(133)
一 学校教育	(133)
二 科举制	(134)
第六节 隋唐的史馆及修史制度	(136)
第七节 隋唐王朝有关图书的活动与制度	(140)
第八节 隋唐五代的邮驿制度	(143)
第九节 唐代的进奏院与政治新闻传播	(146)

第七章 政治传播制度的成熟时期——宋（附元）	(152)
第一节 宋朝的皇帝制度和中央决策系统	(152)
一 宋朝皇帝制度	(153)
二 宋朝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	(154)
第二节 监察谏议制度	(157)
一 中央监察系统——台谏、封驳	(157)
二 地方监察系统——监司、帅司、走马承受及通判	(158)
三 审计与考课制度	(159)
第三节 宋朝的教育制度	(160)
一 贡举取士制度	(161)
二 学校三舍考选制度	(162)
第四节 两宋王朝的图书事业及制度	(163)
第五节 宋代的出版管制与法禁	(167)
一 历代王朝的图书管制概述	(167)
二 宋代以来的出版法	(171)
第六节 宋代公文传递与政治新闻传播	(177)
第七节 元朝的政治传播制度	(180)
一 元朝的政治决策系统与机制	(180)
二 监察制度	(183)
三 宋元的邮驿制度	(186)
第八章 政治传播制度极端化时期——明、清	(191)
第一节 明朝政治传播制度	(191)
一 明朝中央决策系统及其机制转换	(191)
二 宰辅的废弃与内阁制度的演变	(193)
三 司礼监的构成及其机制转换	(195)
四 中央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	(196)
五 明王朝的监察制度	(197)
六 重要的信息传递通道——通政使司	(201)
七 明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204)

八 明王朝的图书事业	(207)
第二节 清朝政治传播制度	(210)
一 清代皇帝制度与中央决策系统	(211)
二 清代监察制度	(218)
三 清代政治信息传递的通道、设施	(219)
四 清朝的教育制度	(221)
五 清王朝的图书事业	(222)

下编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制度 体系及政治传播制度类型论

第九章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分析	(229)
第一节 信息中枢的决策制度	(230)
一 信息中枢决策制度的内容	(230)
二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决策分析及信息传播属性	(231)
第二节 政治信息的传递渠道（包括媒介）制度	(240)
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媒介	(241)
二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渠道	(248)
第三节 政治信息的收集与反馈制度	(252)
第四节 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传播权力调节制度	(253)
一 信息传播是中国古代监察活动的重要特征	(254)
二 从“监视环境”的功能视角看中国古代王朝的监察 制度	(259)
三 中国古代谏议的信息传播特性	(263)
四 从“协调关系”的功能视角看中国古代王朝的谏议 制度	(266)
第五节 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	(272)
一 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综论	(272)
二 从“传承文化”的功能视角看中国古代王朝的教化 制度	(276)

三	帕森斯功能主义社会学观念的启示	(282)
第十章	结语：威廉斯“家长式”传播体制观与中国古代王朝	
	政治传播制度	(284)
一	威廉斯“传播体制”类型中对“家长式体制”的描述 ...	(284)
二	古代社会组织、政治组织起源过程中血缘关系的强化与 父权制度的兴起	(287)
三	“家国同构”和“拟父子”政治关系的阐释——认识 家长式传播体制的基点	(291)
四	中国古代王朝家长式政治传播的几种表现	(293)
	参考文献	(301)
	后记	(308)

导 言

一 课题的由来

2003年，趁着高校教师“读博”的热潮，笔者有幸考取南开大学，攻读专门史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方向）博士学位。结合多年从事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与科研的体会，笔者深感传播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一个研究问题的框架，相当广泛的领域都可以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因为人类的行为与传播不可须臾分离，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传播，人类的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通过博士在读期间的积累与思考，加上原来具有的一点史学素养，笔者选择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与制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笔者当时怀着惴惴之心将想法向导师张分田先生作了汇报，孰料他非常支持，而且认为如果下一番功夫，一定能作出比较有新意、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他对选题也提出了非常务实的意见，即认为题目过大，作为博士论文恐难完成，建议集中精力去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思想，这样也与思想史的专业方向相吻合。考虑再三，笔者极不情愿地舍弃了“制度”部分。

2007年夏天，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王朝信息控制思想研究——以监察、谏议与教化为中心》顺利通过答辩，论文虽有很多未尽如人意之处，但还是受到外审评委与答辩会专家的肯定与鼓励。这为笔者进一步开展与该课题相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更树立了信心。之后的2010年，为了完善与深化研究，笔者又重拾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舍弃的那部分内容——“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制度”，将其申报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并顺利地获得立项。

对于博士阶段完成的部分——“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思想”，笔者的认识是，传播学虽创立于西方，但中国古人在传播实践基础上的传播

观念及思想并不逊色，甚至更为深厚。粗略地说，政治传播思想广泛地蕴涵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论说之中，比如在中央决策、监察谏议、教育教化、编辑出版等与信息传播有关的活动中，必然产生一些主张、见解、观念等，它们应该是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可以纳入传播学的视域进行建构与阐发，并为传播学的实际运用提供范例。

表面上看，中国古代王朝并没有什么“政治传播制度”的称谓，但实际上只要我们站在信息传播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观察到中国古代王朝不但有政治传播制度，而且较为完备。正如新闻传播学者李彬所言：“由于传播学的引入，学术观念发生飞跃，从而使许多以前颇显逼仄的论题一下子变得丰富多样，意韵深广。”^① 笔者以为，一个政权要想正常运行，必然会建立相应的制度，其中也自然包括信息传播（或传递）制度，而据笔者观察，中国古代王朝没有明确的传播制度之设立，但作为控制政治运行的手段，信息传播（或传递）制度的存在则毫无疑问，而且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值得研究、借鉴。用传播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必然会拓新研究领域，开阔学术视野。有鉴于此，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体系》的论文，以信息传播控制的视角粗略地将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制度建构为信息中枢的决策制度、政治信息的传递渠道（包括媒介）制度、政治信息的收集与反馈制度、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传播权力调节制度、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等五大制度体系。^② 该文得到了政治学、传播学界的好评与关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为目前的课题建构了一个研究分析框架，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挖掘与充实。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养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画地为牢的学术研究习惯、学术视野的窄化以及传播学自身特点等原因，可能导致“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这一课题引起质疑的声音。因此，不得不将传播学及传播、政治传播制度等的相关概念进行说明与梳理。

①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 参见陈谦《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体系》，《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

二 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我们可以断言,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传播学者甚至认为,人类基本行为除了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衣、食、住、行外,更应包括“传(播)”。^①正因为传播与人类的行为如影随形,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也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②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对辩论、说服等主题进行过探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同样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传播思想与实践。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有意识地进行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

(一) 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一般认为,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源流:一是欧洲源流,二是美国源流。^③欧洲的传播学渊源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的理论。

更为直接的传播研究则发端于美国的杜威(John Dewey)、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帕克(Robert Ezra Park)及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这些学者对于传播的某一问题的关注和初步研究,构成了日后传播研究的基础。比如杜威认识到“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的重构”;库利提出了对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颇有影响的“初级群体”和“镜中我”等重要概念;米德关于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取得以及自我理论,对日后的传播学具有很大影响。他提出的“主我”(I)和“客我”(me)理论,对理解人内传播(或称自我传播)的社会性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学者外,美国著名评论家和新闻工作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传播学的产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李普曼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拟态环境”,它阐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性”和大众传播对现代人行为的影响;一是“刻板成见”,它揭示了大

① 参见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只是在这些观察与思考中,少有将信息传播问题作专门考察者。

③ 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众传播在形成“刻板成见”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然而，正如当代传播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传播研究都没有实现向传播学的转化，按照他们的认识，“传播研究”转化为“传播学”的标志是“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①。这一转化直到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才逐步实现。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而且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及传播对社会、政治等领域影响的加剧，各学科的学者纷纷进入传播研究领域，但毕竟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兴趣出发，附带地对传播现象做了初步的考察。施拉姆把传播研究“比作学术领域的‘十字路口’和‘租界’，正是对上述情形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十字路口’说明许多人路过此地，路过传播学的研究领地，但很少有人在此逗留；‘租界’则是针对各家学术列强瓜分传播研究的状况而言”。^②而在此后，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可以说是在“十字路口”逗留的人，他们是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卢因（Kurt Lewin）、霍夫兰（Carl Hovland）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他们在传播研究史上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

拉斯韦尔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倡始人之一，在政治宣传研究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1927 年，他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这本书刺激了宣传研究，使之成为当时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 1948 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他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结构与过程，将传播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5W”模式。“5W”模式既可以作为传播过程基本模式，同时也不自觉地勾勒出了传播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对形成传播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卢因的主要专业领域为群体动力学，实际上他研究了不少群体传播问

① [美]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总序），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 页。

题，例如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制约等。他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控制机制的重要理论。

霍夫兰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二战”期间曾应聘担任美国陆军心理实验室主任，研究的重点是宣传教育电影对提高士兵士气的效果。战后，他主持了“关于传播与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并把战时的研究成果整理为《大众传播实验》（1949）。1953年，他出版了《传播与说服》。霍夫兰的学术旨趣在于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诸条件、传播方法和技巧以及受传者本身的属性条件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形成了说服力传播的研究流派。

拉扎斯菲尔德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担任负责人，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听众调研。1940年，他和卡兹等人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对总统大选中的宣传战进行了调查，以测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态度的影响（史称“伊里调查”）。在这项研究中，他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左右人们态度的决定性力量，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因素，如“政治既有倾向”的作用、受众对不同媒介或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机制、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等。根据这项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二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影响。这项研究对否定“枪弹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传统。

除了以上四大奠基人外，让传播研究登堂入室，“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则是施拉姆。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斯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1956年又创办了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他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传播过程与效果》（1954）等。他的贡献在于“对许多与传播有关的学科和理论进行整理、提炼与综合，进而勾画出它的框架结构，充实其他的学说内容，使之具有独立学科的面貌”。施拉姆的学生坦卡德评论道：“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

上,他使这门学科得到完善。”^①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他誉为传播学集大成者。

应该说,传播学属交叉性学科。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从控制论和信息论等20世纪中期的新兴学科那里也获得了新的动力。

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出版了《控制论》一书。几乎与此同时,贝尔实验室的电信工程师香农(Claude E. Shannon)提出了信息论。虽然两者所面对的是技术领域的信号通信,但它们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坎贝尔曾经对信息论作过如下评价:由于香农信息论的诞生,“信息开始作为在整个世界起作用的普遍原理展现在我们面前。它赋予无形以有形,阐释各种运动形式的特征,甚至能够解释以特殊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思维的形态。因此,信息概念可以说是将计算机与传统物理学、分子生物学以及人类传播、语言的进化与人的进化等不同领域相互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梁”。^②控制论与信息论的一些概念诸如信息、信源、信宿、噪声、反馈等,至今被传播学界广为运用。

(三) 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流派

传播学的兴起是多科学者贡献的结果,因而也使传播学有着与众多新兴学科相近的特点,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养分,不断有各种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并带来了本学科的理论传统。李彬认为,“传播学好似一件百衲衣,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学说芜杂,流派林立,其中既有高度抽象化、理论化的成分,又有非常具体化、应用化的内容”。^③美国传播学者罗洛夫(Michael E. Roloff)在谈到大学生学习传播学后的感受时说:“他们对传播学往往有两个总的评价。首先,传播学者所研究的各种现象其范围之广泛,使他们惊讶不已。……大多数学生修完这门课时,总是深感其内容之丰富。其次,是一种多少带点否定意味的评价,这是由于传播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甚多的缘故。……许多学生很高兴能够运用他们在别的课程中学到的理论,但也有的学生抱怨内容重叠。……然而,尽管有

①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②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③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内容重叠的现象，传播学从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提出的理论观点中受益匪浅。”^① 这正说明传播学的综合性、边缘性特征。

以上所述为源自美国的传播学，它总体上被冠以“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的称谓。传播研究还有欧洲的学术传统。虽然身处欧洲的学人没有明确宣称创建了传播学，但他们对传播研究的重视丝毫不亚于美国学界，只是路数不同而已。欧洲以德、法为代表的人文的、批判的研究理路一直受到重视，在传播研究领域也有“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之说。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顾名思义，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批判”，即注重从宏观上研究传播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和传媒持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传统传播学派或经验学派的“病症”，一是过分偏重微观研究；二是过分依赖定量方法；三是很多人站在维护现行体制的立场上。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又有许多分支，如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

此外，还需要指出另一条传播学的发展线索，即很早就有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人际交流的问题，如索绪尔、萨丕尔、巴尔特及霍曼斯、布劳、戈夫曼等。传播学兴起以来，逐渐有学者意识到这些研究成果的传播学意义，因此不少学者有意识地将已有的语言学、符号学及人际交流理论整合为传播理论，使传播学的边界不断扩展。比如我国翻译出版小约翰的《传播理论》^②、罗洛夫的《人际传播——社会交换理论》^③ 等就是将已有的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成果整合为传播学理论的典范之作。

（四）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

早在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传播学产生时期，政治传播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领域，如三四十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大众传播与投票选举的研究，现在看来就属政治传播研究，此后政治传播研究的成果并不鲜见。中国台湾的学者彭怀恩将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理论建构期（20 世纪 50—60 年代）；第二阶段——实

① [美] 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 页。

② [美] 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美] 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